

社会心态的现代性色彩

——以关于《金翼》的三个问题为例

孙飞宇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北京 100871)

摘要: 如果以一种反向阅读的方式来理解《金翼》这一文本,则可以通过三个问题的提出和讨论,为理解现代意义上的焦虑和抑郁问题提供另外一种视角。这种反向阅读是指把《金翼》中的人物置于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社会变迁史背景下,并且将其和当时学界所呈现的关于“青年”的精神气质表达相比较,以凸显出本书主角黄东林的生存状态和自我认同,并因此将其作为一个传统中国人的代表加以理解。这一对于经典文本的阅读所凸显出来的问题和对张表明,以“焦虑”和“抑郁”为代表的社会心态,与“青年”这一现代社会新出现的形象,都呈现一种现代性的气质,并且因此具有某种亲和力,也代表了现代社会的个体化倾向所产生的可能性后果。

关键词: 金翼; 焦虑; 青年; 社会生命

中图分类号: C913.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4505(2024)06-0124-11

DOI: 10.14134/j.cnki.cn33-4337/c.2024.06.012

在过去十余年间,与抑郁和焦虑有关的社会性情绪和心态,逐渐在中国的青年大学生群体中发展成为一种无法令人忽视的现象。中国学界,尤其是心理学界和教育学界都已经关注到青年群体中存在的焦虑和抑郁问题^[1-2]。在社会学界,有关学者在近年来也就这一问题展开了相当程度的讨论^[3-4],不过在相关社会理论方面的思考有待进一步深入。

如何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理解青年,尤其是大学生群体的这些情绪?新自由主义的观点将其放在社会结构的变迁背景下来加以理解^[5],类似地,涉足精神分析、社会学和政治学的学者如弗洛姆(E. Fromme)、马尔库塞(H. Marcuse)、克莱因(M. Klein)等人主张将个体置于社会文化背景、家庭成长环境与教育制度中,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理解此种群体心理状态出现的诸种成因。更具有代表性的说法来自米尔斯在其著名的《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在这部著作中,米尔斯敏锐地抓住了当时美国社会所具有的“焦虑和不安”的社会心态,并且在理解此种心态的努力中指出“晚近心理学和社会科学最激进

收稿日期: 2024-03-02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对中国大学生群体社会心态的精神分析维度研究”(21BSH027)

作者简介: 孙飞宇,男,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长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博士,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主要从事社会思想史研究。

的发现很可能是,人身上最私密的那些特性由如此之多受到社会性因素的调整安排,甚至直接灌输……要理解恐惧、憎恨、爱恋、愤怒等各式各样的情绪,都必须始终紧密结合人们体验和表达这些情绪时所处的社会生活历程和社会背景。”^[6]

本文借鉴这一视角,希望通过文本分析的研究方法来理解这种社会性情绪,讨论中国社会学历史上的一部经典作品:林耀华先生的《金翼》。这部著作是作者根据自己家族的历史和生活写作而成。虽然是小说题材,但是本书使用了生命传记(Life Biography)的手法来展开写作,包含着作者的“亲身经历”和其“家乡、家族”的历史,以黄东林为主要线索,写作了一部家族的编年史。

本书并没有涉及现代意义上的青年人的抑郁和焦虑情绪。不过,如果我们将该著作置于其成书的时代背景下,将其与潘光旦、费孝通等同时代学者的著作相比较,尤其是将其和费孝通先生的《茧》这部小说相比较,就会发现有三个问题鲜明地呈现出来:主人公黄东林有过青年时代吗?他焦虑吗?他在何种意义上是一个传统中国人的代表?这三个问题都与我们所关注的青年和社会心态的问题有关。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分析,我们发现,焦虑和抑郁这两种社会心态,和中国过去百年间所出现的“青年”这一社会现象一样,都有着鲜明的现代性色彩,而当青年在趋向个体化这个方向时,往往会呈现作为社会心态的焦虑和抑郁情绪。换言之,在青年身上出现的焦虑和抑郁等社会心态,具有鲜明的现代性色彩。

一、平衡的生活圈子:社会存在之网络

本书的主要故事发生在从辛亥革命到日本入侵中国的三十年间。主人公生活在中国南方闽江中游的农村和城镇,故事涉及了农业、商业、地方文化与政治等领域。作者说“这正是我青少年时期耳濡目染的一切,是我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本书所描绘的每个事件甚至细枝末节,从本质上讲都是真实的,每个人物都有所指。”^{[7]3}

作为这个四世同堂的家族社会中的一员(小哥),作者通过家族的兴衰故事讲述了中国社会中具有普遍性意义的面向,如社会关系、家族体系与人的自我认同。本书伊始,在讲述东林爷爷去世的时候,林耀华先生运用了一种比喻的手法来讲述他对于中国人的社会生命的理解“我们日常交往的圈子就像是一个由用有弹性的橡皮带紧紧连在一起的竹竿构成的网,这个网精心保持着平衡。拼命拉断一根橡皮带,整个网就散了。每一根紧紧连在一起的竹竿就是我们生活中所交往的一个人,如抽出一根竹竿,我们也会痛苦地跌倒,整个网便立刻松弛。”^{[7]2}

这一理解在本书中无处不在,可以说是统领作者对于中国社会之理解的一个核心理论。例如,在本书开始部分,东林祖父的去世使他感到“哀伤”。这是本书里东林首次出现负面情绪,但是作者说:“他同母亲、兄长一起过活,久而久之又使他恢复了常态。”^{[7]2}在东林创建他自己的人际关系网络之旅中,由于不愿务农,所以他开始在村口商道上的茶馆里卖花生,之后又和姐夫张芬洲一起在湖口镇开了店铺。从这样一个节点,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开始铺垫他的人生与生活。

东林生活中的第一个重大危机,来自本书开头两章。兄弟二人分家后不久,哥哥就去世了。如此一来,这个需要他供养的大家庭里包括了三个女人和六个孩子。在这期间,东林夭折了一个女儿,又生下了一个女儿,但是由于无力抚养,只能送去他人家里做了童养媳。此外,东林最小的侄女(6岁),本来在别人家里做童养媳,但是由于这家男孩的父母都相继去世,生计无以为继,所以只好又被接了回来。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在兄长去世后十年,东林的生活之网重新稳固了起来,“生活重上轨道”^{[7]16}。

在传统社会中,中国人在遭遇重大挫折之后,恢复生活正常的可能性在哪里?作者说,传统也许会

诉诸“风水”之类的解释,然而社会学可以将这种“神秘力量”理解为家庭、家族的变迁背后所存在的社会性机制。这些机制是我们理解中国社会的入手之处“我们必须考虑人本身,考虑使他同人交往并决定他这样做或那样做的生活的圈子。家庭就是这样一种生活圈子,是围绕着一个由习俗、责任、感情和欲望所精心平衡的人编织的强有力的网。抽掉家庭的一员、扯断他同其他人、其他人同他维系在一起的纽带,家庭便面临危机。”^{[7]16}

在这一理论分析之后,作者总结了此前发生在东林身上的事情“东林及其家庭正是处在这种境地。打击接连而至,震撼了他们的生活圈子,几至崩溃。孩子们挨饿,不得不将家里的土地出租,把小姑娘送给别人家,窘迫无比的家庭经济,小女之死等,这都是粗暴地动摇他们生活模式的不断的变故。”^{[7]16}

但是与此同时,作者也看到了传统中国人恢复生活正常的可能性之所在——社会性力量。这种主要呈现在家族、家庭和社会生活中的力量非常坚韧。作者说“人类生活中存在一种尚不受风水控制的弹性,当危机使一切纽带松弛、失效时,生活的圈子中还会有其他一些纽带开始充分发挥作用。东林家的情形便是如此。并非东林生活的所有纽带都卷入了这些危机,没有卷入的逐渐开始使他重新振作起来,并为他的家庭生活建立一个新的模式。”^{[7]16}

换句话说,如果把中国人的生活想象成一张网,那么每个人就是这张网的一部分。或者毋宁说,人及其生活构成了这张网,当这张生活之网的某一部分受到了冲击、损害,或者是松弛失效,剩下的部分就会开始发挥作用,逐渐弥补这张网。人是一种社会存在,是一个弥散在生活中的状态。这种传统中国人的实质,在于其身处其中的网络也即社会关系,而不是在他自己身上。

在本书的最后,作者在以“把种子埋入土里”为题的一章中,概述了本书所讲故事的三个阶段。在起始阶段,青年时代的东林和芬洲合伙做生意,这是他们成功的开始。伴随着他们活动范围的扩大,其社会关系和生命的谱系也都铺展开来。在第二阶段,黄家和张家都遭遇了不幸和麻烦,芬洲和儿子茂衡的接连失败,最终失去生命;东林也遇到了内外困境,不过却“从以往的经验中学会了如何去适应命运的潮流、如何与朋友们携手并进,因而他获得了成功。其结果便是双方出现了越来越大的差异,黄家节节上升,而张家迅速衰败”^{[7]198}。

到了第三阶段,张家已经销声匿迹,而黄家则日益发展起来,在最后遭遇到了“巨大的民族危机”^{[7]199},又回到了他们最初的状态中。

在解释这三个阶段的时候,作者再度使用了网络和均衡的概念。他说“人类行为的平衡,也是由类似这种人际关系的网络所组成。每一点都代表着单一的个体,而每个个体的变动都在这个体系中发生影响,反之他也受其他个体变动的影响……人际关系的体系处于有恒的平衡状态,我们即可称之为均衡。”^{[7]199}

在本书中,人际关系领域的均衡不断被打破,又在主人公的努力下不断恢复常态。有的时候,外来的干扰力太大,对于个人及其家庭、家族的影响过于深刻,“以致在干扰力被取消之后个人或群体却不能恢复原状,而是继续一种非平衡状态直至一个新的平衡状态的确立”^{[7]200}。这种新的平衡可能就和旧的平衡不同了,不过却仍然可能包含着原有平衡的某些因素。在这种从旧平衡到新平衡的过程中,就呈现出了社会的变迁过程。

综观全书,《金翼》这部著作在其人类学式描写中,呈现非常典型的中国式家庭和个体的形象。正如弗思教授在其为本书的英文版导言中所写,本书“像竹叶画一样,其朴素的形式掩映着高水平的艺术”。如果我们将这一幅竹叶画置于时代的背景下,通过反证和比较的方法,就好像从剪影反推出更大的影像一样,也许可以尝试对前述三个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

二、第一个问题: 东林等人有过青年时代吗?

(一) 青年与婚恋

作者在书中将家族史叙事的展开置于中国近代史的发生背景之下。在1910年,东林的第四个儿子,被称为“小哥”的作者出生了。次年辛亥革命爆发并很快影响到了当地。在同一时期,东林的长子,家族里的三哥在1913年前往福州南台岛上的一家教会学校,在那里读书直到1919年。这些家族史表明,该地区的生活正在逐渐呈现具有现代性变迁的色彩。在这段以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为主要特征的历史时期,正如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理论工作中所显露出来的一样,“青年”作为一个问题首次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但是综观《金翼》这部作品的前半部分,我们几乎看不到今天为人所熟知的“五四青年”的时代,在黄东林身上也几乎看不到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对于青年人的颂扬。本书主角黄东林在14岁到24岁成亲之前的阶段里,是一个从小商贩到小老板的创业阶段。在这个生意蒸蒸日上的阶段里,东林为人老成持重,行事规矩成熟,在事业成功之后,他最关心的事情,是要盖一栋新房子以光宗耀祖。

在盖新房子的时候,由于所使用的树木产权问题,东林卷入了一场官司,被捕入狱,同时他和芬洲在镇上的商铺也遭到了土匪打劫。这时,东林的大儿子也即三哥从福州英华学校回到家乡,帮忙上诉,并最终找到了证据,赢得了这场官司。东林在出狱后也借到了钱,赎回了被绑架的伙计。

东林将这场考验视为命运的一部分。通过这一考验,他获得了更大的威望和名声,新居也盖好了。作者以一种人类学的方式描述了迁新居的仪式。这种盛大的仪式和东林在面对新居时的成功者的心态表明,这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中国男性所希望获得的成功。所有这些叙述中,也都没有体现出东林作为一名我们今天所理解的青年的心态和行为特征。东林在本书中所呈现的,是一个从开始做事情的少年时期就已经成熟稳重了的成年人状态。

进而,在本书中我们也几乎没有发现今天或者当时的知识青年群体的恋爱观或者是婚恋观。本书作者花费了更多的笔墨详细描述了几乎同时举行的另外一场盛大仪式:芬洲的儿子茂德和惠兰的婚事。从整个过程来看,这是一场典型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婚姻。从媒人说合到订婚再到结婚的复杂过程,这场婚姻都呈现典型的中国传统婚姻的特征。在这场婚姻之中,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张茂德和王惠兰之间的关系和他们对这场包办婚姻的反应。两位新人在结婚的时候都是青年学生,但是并没有抗拒这场包办婚姻。作者似乎是有意详细描写了这一点。两位新人在婚礼之前都不认识,直到婚礼当天晚上才互相见到。出乎一名现代读者意料的是,作者尤其强调了两位新人对于这一婚姻所抱持的期待和兴奋之感情——哪怕作者特别表明,两个人都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新式思想的影响,但是他们依然对这场婚姻表现出了一种非常传统的态度:他们对于父母的安排都没有异议,对于所有的仪式都积极执行,互相看到对方后都对对方非常满意。换句话说,作者在这里大幅描写了一个令所有人都满意的婚礼和婚姻。在这场婚礼的最后,作者通过笔下人物之口,强调了传统意义上的婚礼的实质——对于芬洲来说,“最重要的是通过儿子的婚事与王家联姻。已逐渐建立起来的交际圈子中现在又增添了新的一环”^{[7]42}。与此相应,本书后来描写了三哥的自由恋爱。不过作者强调说,虽然是自由恋爱,但是在当时,公开恋爱就相当于订婚了。

对于当时处于“新文化运动”中和受其影响的青年人来说,这一婚姻是难以令人理解并且会去极力抗拒的传统封建要求。在同一个时代,潘光旦先生于北京所做的关于中国大学生群体婚恋观的社会调查中,发现了完全不同的结果。1928年,通过他所主持的《学灯》杂志,潘先生征集了关于家庭观念的

3次共317份有效问卷。由于答卷人多为大学里的年轻人,所以颇能代表一代知识新人的思潮。

通过对问卷结果的分析,潘先生发现,青年人强调个体性,热衷于情感,而对家庭婚姻则多不以为然。一个尤其显著的现象是:年轻人受教育的程度越高,则越把婚姻的目的认可为“浪漫生活”。这意味着“浪漫生活为个人之要求,以彼为前提者必坚信个人主义之哲学。个人主义与家庭之安全相抵牾,其过当之发达即为近代家庭制度崩溃之一大原因……”^[8]

然而我们在《金翼》一书中所看到的,是强调通过这场婚礼所构建起来的社会关系体系“芬洲和东林的社会关系现在同样广泛、牢固和有生气,也同样受到人们的敬重,两个圈子紧密交错”^{[8]42}。这与李安宅先生对于“婚姻者,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所做的社会学诠释几乎完全契合^[9]。

(二) 现代青年与东林的社会生命:两种时间观

这种结构关系所表现出来的时间观,与现代意义上的青年所具有的时间观并不相同。潘光旦先生在《中国人文思想的骨干》一文中曾指出:传统中国的一个简单原则,是对外有“伦”(人际关系)、对内有“节”(分寸拿捏),不过这个“伦”并非仅仅是共时性的,而且还包括历时性。这意味着,传统社会从来不会把人理解成一个单独的个体,而理解成在过去与未来相传承的某种社会关系之中整体的人。在对于《金翼》的分析中,渠敬东也特别强调了“社会生命”这个概念,也即社会性和时间性对于一个传统中国人的“整全存在”的意义。渠敬东将《金翼》这本书视为中国人在中国展开中国研究的一个典范。这个典范的意义是说,东林和他的家人们,无论是处于命运的上升期,还是遭遇到了生活的困难甚至苦难,都处于一个“健康”的状态,亦即处于社会之网中,而这张网络是有历史和未来的,是有其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时间观的。

这一社会生命的时间观鲜明地体现在各种礼仪之中。如果说婚姻的主题,也即“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这一目的已经强调了历史和未来在当下的共在,那么节日则更加主要地体现了传统中国人历时性的社会存在。在本书所记述的墓祭节和春节节日中,最为重要的内容就是祖先崇拜。人们通过这一带有浓厚时间-历史感的仪式,获得了自己的归属感和安全感。这是传统中国人的自我认知的一个主要内容。

这一点同样也体现在丧礼之中。芬洲退休并逐渐退出社会生活后,茂德因为心脏病去世,他的妻子惠兰和家人的关系也并没有得到妥善处理。家族人员的损失和外部社会生活的减弱,是这个家族衰落的主要原因和表现。在芬洲妻子过世后,由于以她为中心的社会结构比较典型,所以作者特别强调了这一丧礼的细节。在详细叙述了这个典型的中国传统丧礼之后,作者说“这种聚会可以加强人们之间的社会纽带。举行这种仪式完成了活人对死人以及所有人对死者家属的责任。这样的传统一代代传下去,才不断更新着社会成员间的组合。”^{[7]92}也就是说,丧礼的作用和婚礼、墓祭节一样,都有其典型的社会团结、更新社会纽带的作用或者说功能,而其中和共时性的社会之网同等重要的,是历时性的社会生命。

上述两个大的仪式类型,表现了传统中国社会在社会空间上和时间-历史维度上人的立体存在样态。这两个维度是紧密关联在一起、不可分的。历时性指的是未来与历史共在当下的状态。两种系统的紧密交织,具体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每一天。例如,在农业系统一章中,作者详细讲述了一位普通的中国农民——无论男女——是如何度过他的日常一天的。在一个被农业劳作填满了所有时间的忙碌一天里,不同的家庭和家族之间还要相互帮助——哪怕在日常劳作中,也存在时空交织的社会关系网络。

(三) 社会结构的周而复始

对于东林来说,家族历史意味着一种在结构上周而复始的循环。一个小家庭逐渐演变为大家族,

大家族又分裂为小家庭,尽管“仍有可能指望以亲族纽带来维系各个分支”^{[7]110}。本书从东林的家族陷入低潮开始,讲述了东林通过各种努力振兴家族一直到最后带领子孙重回乡村的故事。这一家族历史就是由家族结构周而复始的不断变化构成的。这些变化既深深卷入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又呈现鲜明的传统文化色彩。例如,1922年,三哥进入现代色彩浓厚的福建协和大学学习,后来又被选为地方教会成员代表,前往美国留学,于1927年回国成为大学教授。小哥则在1932年前往燕京大学读书。1930年,东林担任了商会会长,四哥五哥都成为地方社会的重要人物,黄家的社会关系分别在不同的领域蔓延开来,在商业、政治、学界乃至军界都有其关系,东林家已经成为“镇上最具优势的人家”^{[7]147}。然而这种在新时代里的成功并不意味着东林是一个现代人。东林对于新式学校抱持开放态度,也能够参与到新式经济之中并且获得成功,不过,东林对于人事和命运的理解,以及他的行动特点,依然具有浓厚的传统色彩:他所参与的新式经济,主要依靠的是自己的儿子和家族关系。他依然把亲族关系视为最重要的标准——这一“差序格局”式的心态结构具有典型的传统性。

更重要的是,东林把这些家族的变迁都理解为传统意义上的“命运”。在这段时间里,芬洲家彻底衰败,东林家也受到了诸多大历史的扰动,例如地方政治和内战所带来的影响,以及“九一八事变”对其木材生意的影响等。将这些突发的事件都归结为命运的东林,并没有因此产生当时典型的新青年那种要“救亡图存”或者“改造社会”的思想,而是在每次受到冲击后都努力“回到日常生活的轨道”。跳出本书,我们可以发现,此后中国在政治上的动荡和冲突将会更加激烈地影响到他们的生活,不过无论历史如何变迁,作者在本书里都通过东林的态度指出,“这也只能是短暂地偏离常轨,它不可能阻止他们去争取生存。只要旧有的生活手段依然存在,就不会有多大改变了”^{[7]175}。20世纪30年代和20世纪40年代已经是中国的抗日战争和革命运动风起云涌、大时代的变迁迫在眉睫的年代,然而我们在《金翼》这部著作中所看到的,则是颇为类似于“社会底蕴”的行动和心态^[10]。在这样一种急剧变迁的时代里,不同代际的人群不断以类似的心态和行动模式,重复着前辈们的生活。在这样有着许多共通之处的代际转换中,东林等人当然有过实际年龄方面的青年时代,但是却并没有呈现作为一种社会心态的现代意义上的青年时代。

三、第二个问题:东林焦虑吗?

从晚清到抗日战争这三十年里,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种巨大的社会变迁中,新出现的“青年”群体中弥漫着焦虑和不安的社会心态。此种社会心态得到了当时许多学者的记述和讨论。在1913年的《原杀》一文中,李大钊分析了当时令他感到触目惊心的中国社会自杀浪潮所具有的心理因素:“模仿其一也,激昂其二也,厌倦其三也,绝望其四也。”^[11]时至1919年,北京大学学生林德扬的自杀,引发了蒋梦麟、李大钊、瞿秋白和陈独秀等人持续日久的大量讨论^{[12]35}。众多学者的讨论都集中在当时青年人的心态特征上,包括价值观和自我认同的变化以及由此而来的信仰缺失和生活的无意义感。以罗家伦的观点为代表,当时讨论的焦点之一在于:是青年自杀还是社会自杀?与这种社会心态相比较,《金翼》一书就会呈现一个清晰的问题:东林焦虑吗?东林到底是如何自我理解的?他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精神状态?

综观全书,东林既没有出现过作为一个社会阶段的青年状态,在他实际年龄的青年时期,他也从来没有过焦虑的心态。他在遇到困难时,也从不沮丧和抑郁,用本书中的话来说,“他从不灰心丧气”^{[7]83}。

不过,在东林不是青年的时期,他有两次呈现比较明显的焦虑状态:分别是小哥被土匪绑架和三哥所主持的轮船公司出现了斗争的时刻。东林在前一事件中的表现是“忧虑……思绪混乱,以致有时

他沉迷于鸦片的麻痹之中……脸色苍白,眼窝深陷,额上布满了新添的皱纹”^{[7]134}。而在后来轮船公司的斗争中,当三哥被官方带走以后,“东林焦虑万分”^{[7]192}。

这是本书两处较为明显写东林焦虑的状态。我们当然可以说,此前东林并不焦虑是因为他是一个年轻人,一直处于创业阶段,是一个有着强烈奋斗精神的人,而到了晚年,他逐渐失去了在家庭内外事务上的影响力,变成了一个颐养天年的老人,对于事情无法掌控(儿子们也都瞒着他在讨论问题),所以在心态上会变得焦虑。这一说法在文本中有各种支持,不过我们还要看到:东林焦虑的主要特征在于,都是为家人而非为自己。这一特征看似平常,但是如果我们将其与东林在本书中的其他情绪以及与同时代其他人的情绪相比较,那就比较富有解释力了。

本书所描写的东林另外几种情绪,主要包括一次微笑和两次悲伤。东林的一次微笑非常典型地呈现了中国文化的特点。作者在描述金翼之家建成的时候,特别指出东林的成就在于光宗耀祖:“由于东林自己的创建超过了自己的祖先,甚至超过了备受尊敬的自己的祖父,每逢想起早年的艰辛,为做生意赚钱而奋斗以及遇到打官司的飞来横祸,东林便会久久地注视着这座新居,一种胜利者的微笑便油然而生。”^{[7]31}

从这一“胜利者的微笑”可以看出,在《金翼》一书中,主人公东林和其他的人物,作为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人物群像,能够代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典型人格。或者说,在这本书中,作者描述了一个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人格状态以及与其有关的人格群像。这一状态将自己的成功与祖先的荣光和家族的传承紧密结合在一起。而这一点在他的两次悲伤中更加清晰地显露了出来。

第一次是在本书开篇,东林爷爷的去世事件中。作者写道,祖父的去世使得东林感到“哀伤”。这是本书里东林首次出现负面情绪,然而如前所述,这一哀伤并非焦虑,东林的心情也伴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平复,“他同母亲、兄长一起过活,久而久之又使他恢复了常态”^{[7]2}。由此可见,虽然对于东林来说,“祖父的死使他哀伤一年有余”,然而这种哀伤和抑郁并不相同。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社会之网的逐渐补全,东林逐渐恢复健康。

第二次是在小哥硕士毕业(1935年)之前,五哥去世了。东林对于儿子去世的反应非常典型地表达了传统中国人的悲痛之情。书中写道:“老东林悲悼五哥的殒歿,反省自己的错误。如果不是上天要惩罚他的话,这样的不幸怎么会落在他家?这是当地所信守的一条法则。如果一个人清白有德行,他的一生中就不会有接连的破产和别人的不幸,而现在五哥却可怜地死去了。这条严厉的法则使东林再也没有流露出笑容。他此后严厉地责备自己,正是由于自己缺少德行,才给儿子带来了完全的毁灭。”^{[7]183}

在这个东林一生中第二次非常明显的悲伤中,他作为一个中国老人的心态更加典型,其情绪逻辑也非常值得分析。我们援引另外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中国人在遭遇家庭成员过世的时候所呈现出来的态度和情绪逻辑来加以对比。咸丰二年(1852年)七月二十五日,曾国藩在前往江西主持乡试的路上,得知自己的母亲突然去世,当天夜里给自己的儿子曾纪泽所写的信件中说:“……惨闻吾母大故。余德不修,无实学而有虚名,自知当有祸变,惧之久矣。不谓天不陨灭我身,而反灾及我母。回思吾平日隐匿大罪不可胜数,一闻此信,真无地自容矣。”^{[13]207}而在他父亲去世的时候,曾国藩表现出了同样类似的情感和自责。在咸丰七年(1857年)二月十二日给李元度的信里,他说“家严……仅病七日,遽遭大故,皆不孝罪孽深重,延致此祸。”^{[14]603}

从上述家书中所具有的类似的情绪逻辑可以看出来,东林呈现了一种比较典型的传统中国人对于亲人过世的反应。在这一反应中,个体的认同是在家之上,而非在自身。更具体地说,这里所呈现的传统中国人的自我认同,并非将自己认同到自己身上,而是将自己认同到他所属于的家族、宗族、村落和所处的社会之中。正如渠敬东所说,“就存在论来说,中国人原不是个体本位的,无论君亲师友,还是天地族群,都是人依社会连带关联而实现的自我构成”^{[15]107}。所以,中国传统社会中,个体的生命更像

是一个关系的节点,其生命的实质意义在于和其他人的关系。

这一点,也许我们还可以从东林遇到的多次窘迫困顿,却不断修复生活之网的案例中看到,东林哀伤、喜悦、恐惧、不灰心,如果存在类似于焦虑的感情,那也是为了家人,而不是为了他自己。这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带有病理性质的焦虑不同:后者并不是为家人的——并不是东林式的。

四、第三个问题:东林在何种意义上是一个传统中国人的代表?

德国社会学家海因茨·布德(Heinz Bude)将焦虑作为一种日常存在的基本状态来加以描绘。布德在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来理解一个普通人的焦虑。在他看来,原来份属于共同体并可以适应世界的人,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变为“一个有自主行动能力、社会地位归属明确和对自己有认同感的人”^{[16]26}。这种在现代社会中走向个体性的人群所产生的恐惧或焦虑,其实是自然的,因为对于他们来说,“一切皆悬而未决,却又未失去其重要意义”^{[15]20}。在这个意义上,孤独的大众,必然会产生焦虑。

《金翼》一书的故事发生在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之间,这是一个中国从传统向现代社会剧烈变迁的年代。东林实际上和巴金、曹禺、鲁迅、潘光旦、费孝通等先生笔下的种种人物形象或研究对象属于同一个时代。在这段时间里,辛亥革命、军阀割据、经济动荡、日军入侵等历史事件接续发生,在东林所处的社会世界里逐渐产生影响,构成了其生平情境的重要背景。然而,如果我们把东林和同一时代其他的人物形象或研究对象相比较,就会发现东林并不抑郁,也不孤独和焦虑。他既没有巴金在20世纪20年代的作品中所展现出来的青年人反抗传统家庭的情感与行动,也没有潘光旦先生在“冯小青研究”的“余论”中所担忧的中国社会的自恋病症。在这部著作中,东林只是去“过日子”,适应潮流,维持好和其他人的关系。在该著作所使用的平和叙述风格中,我们在东林身上看起来太多的焦虑和挣扎感;而当我们思考东林有无青年时代,把东林的某些情绪和曾国藩的情感作一比较的时候,就发现,在他身上似乎也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时间感。

在本书中,伴随着1937年抗日战争的爆发,黄家最后回到了黄村,东林又住回了金翼之家。他在最危险的时候“拒绝了孩子们让他离开家乡的请求”,带着孙子们耕种农田。本书最后一个场景是,当孙子们怒视着空中日军的战机时,他却“平静地”说,“孩子们,别忘了把种子埋入土里”^{[7]197}。在本书开头,东林因为不愿意务农才跑出去与人厮混,并且从做花生的生意开始了他的商业生涯,到了本书最后,东林却最终带着儿孙们回到乡村务农。这个结构上的呼应意味深长,仿佛是在说,有一种东西,不会受到一时的政治局势和意外事件的冲击,就像社会底蕴那样生生不息,并不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的线性时间,而是有其日复一日、代复一代的循环和内在的动力。这种社会底蕴的意义,当然就是我们在本书中所能够看到的:中国人的生命是一种社会和历史生命,一个人要把自己放入社会和历史之中,就好像种子埋进土壤里,才会获得生命力。也就是说,一个传统中国人的生命是社会和历史性的,其生命力是散布在社会关系和家族承续之中的,会随着其社会关系与家族承续而发展变化、兴盛或者衰弱。这即是在本书中作者使用那个“竹条和皮筋所构成的网”的比喻的意思,也是两个家族的兴盛和衰落的基本内容。

就对于这一时代变迁的描写而言,费孝通先生在1938年所作的《茧》这部小说,正可与《金翼》相比较。这部小说讲述的是20世纪30年代苏南乡镇地区一家制丝企业里发生的故事。整个故事可以用一名传统社会中女性的生活世界所发生的变化来概括^[17]。主人公宝珠在进入工厂工作几个月后,她的自我认同和理解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是一个宝珠从未梦想过世界。她站在大镜子面前,打量着自己。她的长辫子没了。她不由得问自己,为什么之前要留着这辫子?她轻抚着发丝,骄傲地看着自己。在她的脸上,不再有羞怯顺从,‘我是个女人,我什么都不会’的气息也荡然无存。她那灵动的大眼睛扑

闪着喜悦的光芒。这是一个新的世界,一个新的宝珠。”^{[18]50}

这是一个从传统认同逐渐走向带有现代性色彩的个体认同的典型状态。从这一认同变化出发,她对于人的理解,对于价值的理解都发生了变化。而这些变化是东林从未曾体会过的。“在村子里,她是个贫苦姑娘,一个被抱养来的儿媳,无人看重。她是个不幸的孤儿。难以置信她会得到称赞。到底什么是努力工作?她婆婆已经任劳任怨二十年了,谁夸过她吗?这个新世界的一切很不同,只要付出就会有收获。人生而平等。这使她忘记了所有的困苦,她不再一味顺从,而是有了为之奋斗的目标。她努力工作,不只是为高工资,她想看到从自己操作的机器涌出最好的丝绸。超越别人本身成了一种安慰。”^{[18]51}

宝珠的这一变化是由于她到工厂里做工所引发的。这一来自城乡现代化过程中的变化所带来的“安慰”非常值得讨论。这一安慰存在于和他人的比较之中,而且必须“超越别人”才能够实现。而这一“超越”本身是没有止境的。此外,这一心态是暂时性的,因为通过超越而获得的安慰无法从其本身得到确定性,也就是说,这一超越必须不断发生才可以不断提供确定性。这两点都非常类似于现代意义上的青年大学生的心态。不过,宝珠并没有走得那么远,在该故事中,这一变化依然发生在传统的“家”之中,并没有突破传统家庭的范畴。宝珠和她的丈夫三福彼此之间的误会以及与此有关的冲突是在这部小说中的高潮。而整个故事自始至终,宝珠的变化都没有使得她走出家庭。与此相比,比宝珠更接近现代社会的另外一位女性王婉秋,则呈现为一个“无家”而希望“有家”的状态。她在从学校毕业,从事工作之后明显感觉到了一种“迷茫”的情绪,使得她感到“焦躁”和没有目标感:

“最近她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焦躁。以前在学校,她每天都有课,每学期都有考试,每年都升入下一年级。她的学业朝着明确目标前进,成功可以清楚预期……她虽然才离开学校数月,但眼下的情形却大不相同,她感到自己像是一艘漂泊在航道之外的小船。她如今到底在追求什么?爱人民?爱祖国?一切好似深陷迷雾一般,人民和祖国在哪儿?……王婉秋离开学校,如同离开梯子到了迷宫。她焦躁不安,试着通过读诗来缓解焦虑。但这于事无补。”^{[18]35}

这一焦虑情绪的来源于迷失的感觉。作者写道:“她陷入迷茫,如身在迷宫一般。她需要的是一个家,一个窝,一个扎入泥土中的根,以及一个孩子。”^{[18]47}

在这部小说里,王婉秋的这一焦虑情绪是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重要动力。这一形象和宝珠的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宝珠虽然也发生了自我认同方面的重要变化,但她是处于“家”之中的。而当我们把宝珠和婉秋共同与东林的形象做比较的时候,会发现东林之所以是一个传统中国人的形象,原因在于其一生都没有离开过家和地方历史。他的自我认同和生活世界,都牢牢与他的家庭、家族和家乡绑定在一起。虽然身处一个大时代的变迁过程,并且也受到了这一变迁更为深刻的影响,然而毕其一生,东林似乎都不曾有过宝珠甚至婉秋的体会和感觉,因为他一直都处于家庭和家族历史之中。从潘光旦、费孝通和巴金等人的视角看来,东林显然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青年的特征。他不属于现代意义上的青年群体:他不愤怒,不痛苦,也不孤独和焦虑,没有对于中国的思考和相应的绝望感,更没有对于超出自身家族或宗族之外的大理想的追求,而只是追求日复一日地“把种子埋进土里”。

如前所述,东林告诫孙辈的这句话,似乎就是他一生的写照。他一直处于一个人际关系网络之中,并且善于培养和运用这个网络。在这个网络中,他生存、生活得很好。从始至终,除了“余德不修”的这种自我批评,东林好像都没有反思意识,没有反思或质疑过他的生活,也没有像自己的儿子们一样,独立外出生存的经历。即便是他的两个外出读书的儿子,似乎也对这个体系非常熟稔,没有反思和批判的意思——我们在本书中找不到对于传统中国社会生活的批判。然而如前所述,这部著作的故事所发生的时代,正是20世纪前半叶中国学界和知识分子们思想变化最为激烈的时期。也正是因为这一背景,本书才有可能成为一个在研究上可资对照的案例,才有助于我们理解《茧》这部小说中的两位

女性。

通过这一比较可以发现,东林可能会有愁苦和困难,但是这种愁苦和困难并不是来自他对自己的思考,而是来自他在家族、家庭之中和他人的关系。东林一生都处于“在家”的状态。他所追求的平衡与调适,不仅是属于个人的,也是家庭的、家族的平衡。他不存在心灵安放的问题,因为他作为一颗种子,一直都将自己扎根在土地里。从他的视角来看待巴金、潘光旦乃至鲁迅等人所描绘的年轻人,以及李大钊、瞿秋白和陈独秀等人所讨论的那些年轻人,他应该会感到疑惑:年轻人不易或者不愿扎根在土地里,而是希望有自己独立的生命。这一独立的生命,既有别于家庭、家族关系,也有别于历史的承续,而是强调自己独特的生命时间。然而这一独立的生命,又要扎根在何处呢?

五、总结与讨论

本书清晰地阐述了一个传统社会中的人将自己认同于家的状态。如果要讲中国人的家,就不能仅仅从某种标准化的定义或者概念来理解,而是要从某种活生生的、情景化和历史化的甚至是整体性的状态来理解。东林的家、家族、宗族、地理、风水、城镇、远方的亲人和身边的伙伴,都是一个整体。东林是一个属于整体的人,就好像种子扎根在大地中一样。这种对家的理解和我们对于焦虑、抑郁的思考有什么关系?

作者说,人类生活的历史就是一个在不断地平衡和纷扰之间摇摆的过程。然而无论是平衡还是纷扰,我们在本书里都看不到同时代其他的研究者所关注的那种呈现为焦虑与抑郁的精神气质。在本书中,林耀华总结了四种导致人类社会变迁的因素,分别是物质环境、技术、人物班底和外在因素。这些因素的变化导致了既有体系的变化,带来了新的均衡。但是在形成新的平衡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的不是个人文化,而是一种强调整体的文化。除了人际关系、习俗传统和技术符号等之外,它还包括各种物的共在:“有一个形成整个气氛的环境存在,像桌、椅、酒壶、药箱、尺、柜台、秤、钱和账簿等物品,以及量、秤、算、写这些技术,还有人们谈话、记录所使用的语言文字,在买卖中所形成的习惯,这些全部组成制约人民交往关系的环境因素。”^{[7]200-201}这里对于人之主体性的理解是泛义的,是超越了人的身体乃至社会关系的,类似于潘光旦先生在“位育”这一概念中所阐发的对于人的理解。

时至今日,中国社会依然处于持续的现代转型状态之中。传统意义上的人与现代人之自我认同的对比也依然鲜明。当青年这种现代性个体,选择以个体化的方式从传统中挣脱出来的时候,其自身所具有的独特性和自我认同,就必然会带来诸多作为现代性问题的情绪。我们以《金翼》这样的研究为思考起点,并非意在批判当今的青年人脱离了家庭,或者说没有把种子埋进土里,而是说,本文所讨论的三个问题,呈现了焦虑和抑郁作为一种现代性问题的色彩。对于《金翼》这本书中所讲述的内容及其所隐藏理念的此种解读,可以成为我们理解今天造成青年人心态的起点之一。现代意义上的青年,作为独立的个体,在承担着自由的同时,也作为寻求意义的个体,而与焦虑和抑郁的社会心态存在亲和力。

参考文献:

- [1]刘云杉.拔尖的陷阱[J].高等教育研究,2021(11):1-17.
- [2]李伟,陶沙.大学生的压力感与抑郁、焦虑的关系:社会支持的作用[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3(2):108-110.
- [3]李春玲.疫情冲击下的大学生就业:就业压力、心理压力与就业选择变化[J].教育研究,2020(7):4-16.
- [4]秋丽雅,李建新.中国成年人抑郁的社会分化:动态视角与交叉视角[J].社会学研究,2023(5):180-202.
- [5]萧易忻.“抑郁症如何产生”的社会学分析:基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视角[J].社会,2016(2):191-214.
- [6]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M].李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225.

- [7]林耀华. 金翼: 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M]. 庄孔韶 林宗成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2.
- [8]潘光旦. 中国之家庭问题[M]//潘光旦. 潘光旦文集: 第1卷.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147-243.
- [9]李安宅. 《仪礼》与《礼记》之社会学的研究[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 [10]杨善华, 孙飞宇. “社会底蕴”: 田野经验与思考[J]. 社会 2015(1): 74-91.
- [11]李大钊. 原杀(暗杀与自杀)[M]//李大钊. 李大钊全集: 第1卷.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9: 606-610.
- [12]海青. “自杀时代”的来临? ——二十世纪早期中国知识群体的激烈行为和价值选择[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 [13]曾国藩. 曾国藩家书[M]. 唐浩明 点校整理. 长沙: 岳麓书社 2015.
- [14]曾国藩. 曾国藩全集·书信[M]. 殷绍基 整理. 长沙: 岳麓书社 1990.
- [15]渠敬东. 探寻中国人的社会生命——以《金翼》的社会学研究为例[J]. 中国社会科学 2019(4): 98-122.
- [16]布德. 焦虑的社会[M]. 吴宁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0.
- [17]凌鹏, 孟奇. 家、工厂与中国现代个体的诞生 对《茧》中人物生活世界的分析[J]. 社会 2023(1): 173-202.
- [18]费孝通. 茧[M]. 孙静 王燕彬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1.

Modernity of Social Mentality: Three Questions out of *Golden Wing*

SUN Feiyu

(Sociology Department,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This essay, through a reverser reading, hopes to provide another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modern anxiety and depression. Different from other interpretive efforts, this essay, in three questions, put the book *Golden Wing* and its protagonist within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early 20th century's China and the related expressions of ethos of the young generation that had been made by many other authors. Within this background, we will find out that, the existence and self-identity of Donglin are very different from many other young people that we know from other authors. The emergence of the “youth” and social emotions such as anxiety and depression all revealed the ethos of modernity, and thus an affinity, representing the trend of individualization and probable consequences.

Key words: *Golden Wing*; anxiety; youth; social life



(责任编辑 张伟 洪小秋)